原始工业化新论与当代中国的乡村工业化

陈 勇

作者 陈 勇, 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西欧 原始工业化 中国乡村工业化

提 要 “原始工业化”新论是对近代西欧乡村工业发展的理论概括, 也是人们关注乡村工业历史和现状的产物。新论强调乡村改造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值得从总体上予以肯定, 其完善有待研究的深化和方法的改进。新论涉及的农民与工业化的关系, 与当代中国乡村工业化有着相通之处。尽管时代背景互不相同, 原始工业化理论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当前, 乡村工业正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引起人们的关注。本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乡村工业的普遍兴起, 促使有关政府和机构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克服以往重城轻乡的片面倾向, 选择城乡结合的工业化道路。现实的选择也激发着历史的思考。发展经济学家在结合乡村工业重新探讨工业化、现代化理论的同时, 往往联系发达国家过去的工业化进程进行比较, 并同史学界持续已久的有关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讨论交相呼应。正是从60年代起, 西方史学界陆续形成了一大批近代乡村工业的研究成果, 并推出了新的“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论。新论是对已有工业化理论的发展和深化, 于中国当代的乡村工业化也不无历史启迪。

1971年, 美国《经济史杂志》刊发的述评文章《20世纪70年代欧洲经济史研究课题》, 将原始工业化列为该领域三项重点研究课题之首^②。次年, 曼德尔斯在同一刊物发表了专题论文, 系统论述了原始工业化的基本内涵, 强调这场“乡村工业化”(rural industrialization)构成西欧整个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 为第二阶段的机器大工业化准备了历史条件^③。此后, 西方经济史、社会史诸多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和讨论, 并在1982年于布达佩斯召开的第8届国际经济史大会上予以阶段性总结, 由曼德尔斯作了题为《原始工业化的理论和实际》的总报告。目前, 有关原始工业化的研究仍在继续推进, 自称“第二代学者”的研究群体正在涌现, 集体性研究成果已经问世^④。值得注意的是, 原始工业化的研究对象已从最初的西欧地区扩大到东亚的中国(包括台湾地区)、日本、韩国, 以及南亚、北美和西非等地。时间范围也从近代早期延伸到当代。由此可见, 新论的推出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原始工业化的研究仍在继续深化, 在一系列问题尚存许多争议, 但迄今为止的讨论, 已凸现出新论的主要内容:

第一, 关于原始工业化的定义。新论认为, 原始工业化是“工业化前的工业化”, 是“以传统方式组织而又面向市场, 以乡村为主的快速工业增长”。

“原始工业化”新论的创立人是60年代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年轻的经济史博士富兰克林·曼德尔斯(Franklin Mendels)。他所撰写的学位论文《18世纪佛兰德尔的工业化与人口压力》, 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观点, 认为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 西欧首先经历了一场可称之为“原始工业化”的经济变革, 其核心是“以乡村为主的制造业活动的扩张”^①。论文尚未公开发表, 就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其主要繁荣期为16至18世纪。面向外部市场、农民参与以及乡村工业与商业性农业的地区分工,构成原始工业化的三项基本要素

第二,原始工业化造成了新的人口增长机制,早婚多育成为乡村人口增长的主要特征。这种新机制的形成,与非农生产收益的增加、乡村工业的家庭生产单元和劳动密集性息息相关。

第三,原始工业化促进了乡村工业生产和商业性农业的地区分工,但乡村工业繁荣之地却是农业生计短缺之地。土壤贫瘠的山区丘陵成为乡村工业的主要集中地带,“糊口农业应被视为原始工业化的农业基础”^⑤。

第四,原始工业化先于大工业化,并且为大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但前一种工业化并不必然和自动导致后一种工业化。在缺乏大工业所需原料和能源的地区,尤其是社会—政治结构不相适应之地,原始工业化与大工业之间的联系会陷于断裂,出现“逆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状态。乡村工业化在这种情况下或者陷入严重危机,或者濒于崩溃而复归“乡村化”。

作为一种工业化新论,原始工业化理论在形成过程中不乏批评意见,其中最为突出的批评文章可举两篇。一篇是科尔曼(D. C. Coleman)所撰《原始工业化:一个内涵太多的概念》;另一篇为霍斯顿与史纳尔(R. Houston and K. D. M. Snell)合撰《原始工业化:茅屋工业、社会变迁与工业革命》^⑥。他们的批评虽然在内容上不尽一致,但涉及的问题大体相同。原始工业化的农业背景、人口机制、两种工业化的关系是其争议的主要方面。

在农业背景方面,批评者认为,以原始工业化比较典型的英国为例,乡村工业的分布十分广泛,相当部分的乡村工业并不位于贫瘠山区。乡村工业的农业背景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糊口农业地区,也包括商业性农业地区,乡村工业并不必然是“贫穷之子”。例如,位于英格兰东部的东盎格利亚地区,地势低平,谷物种植与养羊兼营的“混合型”农业居主导地位,谈不上是一个农业凋蔽之地,而以毛纺织业为主的乡村工业在当地却颇为发达。

关于原始工业化的人口机制,批评者采用了著名的剑桥大学“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的统计成果,对17—18世纪莱斯特郡内的工业村庄什普些德(Shepshed)与另外11个农业教区的妇女初婚率进行了比较,发现情况恰好与原始工业化理论构筑的人口模式相反,农业村庄的妇女平均初婚龄明

显低于工业村庄。例如,17世纪上半叶11个农业教区的平均初婚率为25.4岁,而什普些德村的这一数字却为28.5岁,高于前者约3年^⑦。因此,早婚并不是原始工业化地区必然的人口现象。

在两种工业化的关系方面,批评者的否定程度更大。他们不仅认为英国原始工业化地区向大工业化顺利过渡的数量不占多数,而且连原始工业化为大工业化所准备的资本、劳动力和市场前提也予以否定。科尔曼归纳了英国10个主要的原始工业化地区,其中成功过渡到大工业化的只有兰开夏、约克郡、西米德兰和特伦特等4个,其余包括东盎格利亚在内的6个地区均告失败。霍斯顿与史纳尔则着力否定三项“前提”,认为1820年以前,甚少见到乡村商人企业家转化为工厂主之例,难以证明两种工业化的资本关联。他们认为所谓劳动力前提更见薄弱,因为英国工厂制机织业工人几乎完全来自非手织工家庭。而海外市场对于英国来说,仅到1800年以后才显得重要。在此之前,英国工业品的出口比例很低,1745年后的出口增长率实际为负数,因此工业品的国内市场远比海外市场重要。

平心而论,这些批评意见固然从一方面促进了原始工业化问题的讨论,但其所持论据、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由此产生的观点,尚存有不少可议之处。例如,他们最为着力反驳的两种工业化的关系,新论提出者一开始就持两面观,首先提出了“逆工业化”的可能性,并未在原始工业化的历史走向问题上偏于顺向发展一端。至于批评者论据、方法方面的问题,则更流于简单片面。随着研究的深入,已有更多的成果可以引为反证。

二

原始工业化理论的首创者曼德尔斯曾说,新论的推出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旧事新解”^⑧。的确,早在新论推出之前,已有众多史家述及西欧近代乡村工业的发展。16至18世纪,英国、尼德兰、德国莱茵兰地区、瑞士、法国西北部等地,乡村工业的兴起,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同时代人,曾著《鲁滨逊漂流记》的英国人丹尼尔·笛福,于1724—1727年将其旅行所见撰为《大不列颠各地漫游记》,书中记载了大量乡村工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画面。为工业革命史留下一部“经典”之作的法国史家保尔·芒图,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里更有专章追溯大工业的起源,详细叙述了英国乡村工业的史实。近年来,西方史家细心整理历史档案,又从大

量地方档案中发掘出更多的具体材料。原始工业化新论的产生,正是以此为宽广的背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新论的评价,应当特别注重考察其立论与方法的正确与否。当然,这并不是脱离史实,历史研究毕竟需要史论的有机结合。

新论可取之处,首先在于它意识到西欧工业革命的发生,必须以传统社会的初步改造为历史前提,而传统社会的主体就是乡村。因此,关注乡村的社会经济变动,是正确认识工业革命起因的重要途径。新论从乡村工业兴起的事实出发,建构“原始工业化”这一理论假说,至少是深化工业化、现代化研究的一种有益尝试。工业革命在西欧历史上是一场“突变”还是“渐变”,如何把握和认识工业革命的“革命”二字,这在西方学术界早有争议。不过,即使强调英国大工业化革命性影响的经典作者保尔·芒图,也十分冷静地指出,“无论产业革命如何迅速,但它却有它的一些远因”,“它只不过加速并完成了—一个早已开始了的演变而已”,“—长串的事实已从老远预示着并准备着产业革命”^④。芒图所说的“远因”、“事实”,就包括商人资本家在乡村各地广泛组织的家内制工业生产,尤其是乡村纺织业。

一些对原始工业化理论提出过种种质疑和修正意见的史家,并不因此否定新论的整体价值。瑞典史家艾萨克森(M. Isacson)和马格纳森(L. Magnusson)指出,尽管原始工业化理论模式忽视了西欧乡

村工业组织的多样性,对两种工业化联系的解说也不够充分,但是这种理论有两点值得肯定:其一,它指出工业化是由前工业社会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变迁促成的;其二,它强调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形成过程^⑤。他们并未像霍斯顿和史纳尔那样主张完全“抛弃”新论^⑥。应当说,这种持论是客观和公允的。评价一种新的理论假说,首先应当从整体上予以审视。任何历史研究的理论假说都不可能是全然的,关键要看它是否抓住了历史的本质特征,是否基本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原始工业化理论正是抓住了近代早期西欧工业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的主要工业发展特征,因而对这一历史变动的事实作出了基本正确的整体概括和抽象。它把西欧乡村工业普遍兴起的大量历史现象提升到理论认知的高度,使人们能够深刻认识这种历史现象内含的重要社会变化。为了说明问题,不妨看看工业革命发祥地英国在近代早期经历的人口结构变动(见下表):表中情况显示,16至18世纪英国城市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有了显著提高,由1520年的5.5%上升到1801年的27.5%。然而,乡村非农人口的比例变化更为引人注目,由1520年的18.5%上升到1801年的36.25%,超过城市人口变动。同时,乡村人口中非农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数量对比也由相差悬殊到彼此相当,1801年两者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已经相等(36.25%)。

英国近代早期社会人口结构(%)

年代	城市人口	乡村人口(I + II)	I. 农业人口	II. 乡村非农业人口
1520	5.5	94.5	76.0	18.5
1600	8.0	92.0	70.0	22.0
1700	17.0	83.0	55.0	28.0
1750	21.0	79.0	46.0	33.0
1801	27.5	72.5	36.25	36.25

资料来源:据 E. A. Wrigley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able 4改制,见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XV: 4 (1985)。城市人口以5千人以上规模的城镇为准。

这些数字反映,经历原始工业化的洗礼,尽管乡村人口仍占社会总人口的大部分,但其中农业人口比重已大幅度下降,而乡村非农人口的增长成为十分突出的人口现象。在英国由传统农业社会走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乡村工业的初始作用不容低估。正是从社会变迁的整体意义上,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原始工业化理论建构的价值,肯定其观察历史现象的眼力和识见。

诚然,原始工业化新论也确有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有些观点需要修正,有些观点可以商榷,还有一些观点则可加强论述的深度。如乡村工业的农业背景,过分强调农业生计不足便具有明显的片面性。西欧乡村工业兴起之地确有部分为农业生产条件不佳的山地丘陵,但情况并非一概如此,农业条件好而产生乡村工业的情况也并非罕见。美国马里兰大学女史家古里克松(G. L. Gullickson)发表过

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⑤，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实的个案研究。她以法国诺曼底的科地区(the pays de Caux)为对象，详细论述了这个谷物生产丰饶之地乡村棉织业的兴盛过程，指出糊口农业并不是乡村工业的天然伴侣。城市商人资本与乡村剩余劳动力的结合，以及便利的市场条件，才是科地区棉织业兴起的原因所在。类似情况在有关英国、尼德兰乡村工业的研究成果中也得到证实。其实，研究乡村工业的农业背景之所以易于发生偏误，其症结之一在于新论推出者的观察视野和分析方法。曼德尔斯等人在构筑理论时反复强调原始工业化是一种“地区性现象”，并进而强调“以地区为分析单位”^⑥，因而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往往不能将微观考察同宏观考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个很明显的道理受到忽视：乡村工业的发展，必须以食物的有效供给为前提。事实上，从西欧原始工业化的全局考察，乡村工业的农业背景不是农产匮乏，而是供给有余。近年来西方农业史研究已经做出了有说服力的成果。

两种工业化关系的讨论也流露出相似的缺陷。单纯以地区为分析单位，必然过分执著于地区范围内原始工业化向大工业化过渡的成败，或者仅仅以过渡成败的地区数量多寡来判定前后工业化的关系。持否定论者并不理解经济地理的区位变动是近代经济发展的常态，某一地区内某种部门的经济衰变并不能反映整个社会经济的走向。英国原始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的地理重心由东南转向西北，是西北地区约克郡、兰开夏、西米德兰乡村工业后来居上并渐次向大工业化过渡的体现。顺利过渡到大工业化的乡村工业地区，其数量或许不及非顺利过渡的地区，但在经济能量和幅射力方面却远胜于后者。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等西北部乡村工业中心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影响超越国界洲界，恰恰从本质上反映了原始工业化与大工业化的历史联系，数量多寡论不足为法。

至于原始工业化的人口机制，目前尚难作出系统说明，需要充分占有材料予以探索，现有争辩双方均很难完全说服对方，因而不必急于作出定论。

三

作为研究的特点之一，原始工业化理论在推出之始就对现实的发展中国家有所观照。曼德尔斯在1972年的论文中简略提到，这种理论假说同时也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西方的某种经验。英国史家克拉克森(L. A. Clarkson)在后来的讨论中则指出，促

使发展经济学家关注西欧历史经验的主要因素是农民与工业化的关系，这同样导致史学家把自己的研究与发展中国家的农民问题联系起来^⑦。

当代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大量农村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建立在大规模的、局限于城市而又资本集中的工业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在雇佣劳力和调节收入分配不均现象等方面未达到预期的结果。因此，作为总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在农村发展非农业生产事业被许多人看作是可采取的另一个发展战略”^⑧。至本世纪70年代初，据世界银行调查，亚洲发展中国家从事长期或临时性非农产业的乡村人口比例已达到35%~60%的水平^⑨。70年代末兴起的中国乡镇企业，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乡村工业化的新潮流，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至1991年，中国乡镇企业的产值已实破1.1万亿元，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苏南模式”是中国当代乡村工业化中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从1978年至1993年，苏南乡镇企业先后跃上三个台阶；1993年产值达到2700亿元，在地区工业中“三分天下有其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走出了一条农业国工业化的超常规发展道路^⑩。费孝通先生感慨地指出，中国乡镇企业产值从1984年的1千亿元增长到1991年的1万亿元，仅花费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952年的1千亿元到1983年的1万亿元，却用了整整31年^⑪。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也高度评价中国的乡镇企业，认为它开启了城乡互动的发展道路，标志着“现代发展的开始”^⑫。

不过，与迅速发展的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实践相比，已有的理论研究还明显滞后。在这方面，原始工业化的理论探索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外来借鉴，中外历史的比较也有助于加深对当代中国乡村工业化意义的认识。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对此已有所尝试。他指出：“英国经典发展模式与第三世界相比，有一个常被人忽视的差别：后者的农村(或农业)发展一般远远落后于城市(或工业)发展”，而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并未“与农村的质变同步”。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乡村家庭手工业未能像西欧近代早期的“茅屋工业”那样，成为“工业化的跳板”^⑬。他研究历史与现实的中国乡村，但却将曼德尔斯等人的西欧原始工业化研究成果列为参考文献并加以引用。海外华人学者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重视。

原始工业化新论与当代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关联，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予以认知：

第一, 原始工业化新论表明, 乡村工业化是工业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使在西欧历史上, 乡村工业化也构成以城市为中心的机器大工业化的序幕与前奏。因此, 事实并非如以往许多人想象的那样, 西方工业化就仅仅是大工业化或城市工业化。应当克服对西方工业化史的这种误读, 并进而再认识工业化的理论内涵。由此, 当代中国乡村工业化的作用和地位, 也可从理论认识上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第二, 原始工业化新论表明, 乡村工业对于改造传统农业社会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西欧近代早期大批乡村非农人口的出现, 大大促进了社会的近代转型, 使乡村的社会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改观, 为工业社会的诞生准备了有利条件, 其意义不亚于同期的城市化。乡村工业化也直接促进了乡村城市化。许多乡村工业中心本身就成为城市化的新增长点, 如曼彻斯特等地的演变所提供的明证。当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崛起也不仅仅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意义, 而同样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乡镇企业的兴起推动了小城镇建设, “乡村中的都市”渐见端倪。乡村人口的职业构成、文化素质、精神风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重要变化。这必然加快中国的现代化步伐。

早在原始工业化理论形成时期, 美国著名社会史家查尔斯·蒂利就曾指出: “今日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西欧工业化之间的最大差异之一, 在于后者乡村中较早发生的‘原始工业化’”^①。可见, 乡村工业化是西欧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原因之一。西欧乡村工业化是“工业化前的工业化”, 而中国的乡村工业化则是“工业化中的工业化”(即工业化进程中“异军突起”的工业化)。两者的发生既有历史的差距, 也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国际背景。所以, 中国的乡村工业化自有其不同的时代特色和发展道路。尽管如此, 两者仍在农民参与工业化方面具有相同的内涵。正是在这一共性上, 原始工业化新论仍然不失其理论和历史参考价值。

注 释:

①⑧⑩ 见曼德尔斯:《原始工业化的理论和实际》, 载《第八届国际经济史大会》(Franklin F. Mendels,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ory and Reality,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conomic History), 布达佩斯 1982 年版。

②④ 查尔斯·蒂利与理查德·蒂利:《20世纪 70年代欧洲经济史研究课题》(Charles Tilly & Richard Tilly, A-

genda for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1970s), 载《经济史杂志》第 31 卷 (1971 年)。

③ 曼德尔斯:《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Franklin F. Mendels,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载《经济史杂志》第 32 卷 (1972 年)。

④ 奥杰尔弗与克尔曼主编:《欧洲的原始工业化》(Sheilagh C. Ogilvie & Markus Cerman (eds.), European Proto-industrialization), 剑桥 1996 年版。

⑤ 克里德特、梅迪克与希伦伯姆:《工业化前的工业化》(Peter Kriedte, Hans Medick and Jürgen Schlumbohm,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剑桥 1981 年版, 第 26 页。

⑥⑦⑩ 霍斯顿与史纳尔:《原始工业化? 茅屋工业、社会变迁与工业革命》(Rab A. Houston and Keith D. M. Snell, Proto-industrialization? Cottage industry, Soci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载《历史杂志》第 27 卷 (1984 年) 科尔曼文见《经济史评论》第 36 卷 (1983)。

⑨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第 9、19、52 页。

⑪ 艾萨克森与马格纳森:《斯堪的纳维亚的原始工业化》(Maths Isacson and Lars Magnusson, Proto-industrialization in Scandinavia), 利明顿斯帕 1987 年版, 第 14 页。

⑫ 古里克松:《农业与茅屋工业: 原始工业化导因的再确定》(Gay L. Gullickson, Agriculture and Cottage Industry: Redefining the Causes of Proto-industrialization), 载《经济史杂志》第 43 卷 (1983 年)。

⑬ 克拉克松:《原始工业化: 工业化的第一阶段?》, 载同作者主编:《工业革命概要》(L. A. Clarkson,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 A. Clarkson [e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Compendium), 麦克米兰 1990 年版, 第 198 页。

⑭⑮ 王慧炯、杨光辉主编:《农村的非农业发展: 亚洲的经验与中国的前景》, 气象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1-4 页。

⑯ 夏明文、陶伯华:《探索农业大国工业化的超常发展道路》, 载张培刚、谭崇台、夏振坤主编:《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⑰ 费孝通:《中国城乡的发展道路》, 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 年第 1 期。

⑱⑳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第 319、313、15、14 页。

(责任编辑 吴友法)